绿色投资：概念界定及其影响因素

马延柏

摘要：通过绿色投资改善环境质量已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立足已有文献研究，梳理和归纳绿色投资相关概念以及影响绿色投资行为的因素。首先从定义、内容构成、测算三个方面梳理绿色投资相关概念并进行界定，进而从环境监管、市场竞争、公众监督、公司治理等多维度归纳影响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内外部因素，在此基础上从因素来源、投资意愿、影响阶段三个角度讨论和总结上述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认识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以及优化绿色投资活动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关键词：绿色投资；可持续发展；概念界定；影响因素

一、问题提出

自 18 世纪 60 年代陆续开始的两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特别是 19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也使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相伴而生。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张，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比如，人类不加节制甚至掠夺性地资源开采和利用，大肆向自然界排放污染物，乱砍滥伐和过度放牧等诸多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已危及人类的生存安全。随着全球气候日趋变暖，人类必须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形势。世界各国开始关注和投身于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一系列文件的签署，正在引领世界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也使得开展绿色投资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

尽管绿色投资对于改善生态环境有着十分理想的效果，但是这一普遍共识并未促使行为主体的行动产生立竿见影的环境效益，在实际执行中总是困难重重。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绿色投资的正外部性以及企业的逐利性，行为主体对如何进行环境决策往往举棋不定。不同层级行为主体在绿色治理上应该投资多少、何时投资、向哪些领域投资、投资产出如何商业化、如何评价投资绩效、哪些因素在掣肘投资决策、如何将绿色投资与商业投资和组织战略相结合？目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尚无定

基金项目：甘肃省青年科技基金计划“绿色投资对甘肃省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22JR5RA310）

作者单位：马延柏，兰州理工大学。

论。绿色投资是一项蕴含道德伦理精神的经济活动（孟耀，2006），在现实中经济利益往往会战胜道德良知。承担环境责任意味着组织要将社会责任感与可持续发展纳入其管理模式，其生产经营活动应该造福于社会而不是损害环境（Fontaine，2013），这对私人而言是一个重大挑战。

面对这项复杂的管理过程和经济活动，有些国家和地区对绿色投资的认识表现得浅显和片面。比如，对绿色投资、环保投资、环境投资、道德投资、社会责任投资等术语不做严格区分的混淆使用；对于如何激励和扩大绿色投资，由于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政策设计和实践应用也经常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形，不能对环境质量产生实质性的改善作用。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绿色投资相关文献，对绿色投资概念范畴进行界定，进而归纳影响绿色投资活动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讨论影响因素在不同视角的关联，为利益相关者进一步了解绿色投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二、绿色投资的概念界定

绿色投资包括针对环境问题的各项投资。从现有文献来看，这是对绿色投资（即环保投资）的狭义界定（逯元堂等，2010；唐国平和李龙会，2013；Eyraud et al.，2013；Chariri et al.，2018）。而从绿色投资的广义内涵来看，一切有利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资本支出都可以称为绿色投资（孟耀，2006）。由于对绿色投资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理论界对其概念赋予的解释多种多样、尚不统一，对其内涵和范围的界定还不够清晰。根据已有文献对绿色投资的定义和范畴界定，绿色投资的相关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绿色投资的定义。埃劳德等（Eyraud et al.，2013）将绿色投资定义为在不显著减少非能源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前提下，减少和控制温室气体等各种污染物排放而进行的投资，如对节能技术和可再生技术的投资、绿色技术的研发。沙尔滕布兰德等（Schaltenbrand et al.，2015）认为，绿色投资是一种将绿色运营策略转化为管理行动的重要机制和举措。逯元堂等（2010）、唐国平等（2013）则给出了比较笼统的定义，凡是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有关的投资均应纳入绿色投资的范畴。孟耀（2006）对绿色投资的定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他对绿色投资在狭义、广义层面的定义及其异同点、存在的问题做了比较和完善。他指出，绿色投资是以保护资源与环境为核心，兼顾经济、环境、社会三重效益为基本要求，承担社会责任的投资活动。在这一定义中，以保护资源与环境为核心体现了绿色投资的狭义含义，而兼顾经济、环境、社会三重效益、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和谐则体现了其广义内涵。

第二类是绿色投资的内容和构成。唐国平和李龙会（2013）对绿色投资的结构做了较为清晰和科学的界定。他们通过梳理已有关于环保投资结构的内容界定的相关研究发现，部分学者和部门界定的环保投资结构体现出概括性、多重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在具体内容上没有区分投资主体、投资目的的差异和共性，而政府环保投资与企业环保投资的结构、内涵与特征必然因其投资主体、投资目的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管理费用与支出等方面的处理上，政府与企业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区别。企业是经济的主体，是能源的主要使用者，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生产者（Huang & Lei，2021）。唐国平和

李龙会(2013)主要界定了微观企业层面的环保投资结构,根据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环境治理与环保投资信息,将企业环保投资结构分成了七类:环保技术的研发与改造支出、环保设施及系统的投入与改造支出、污染治理支出、清洁生产支出、环境税费、生态保护支出和其他^①。

第三类是绿色投资的核算和测度。由于对绿色投资的第一类和第二类概念界定存在不统一、不规范、不完善等诸多缺陷,对绿色投资的核算和测度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产业界。逯元堂等(2010)表示,由于环保投资的内涵界定不清,与国际接轨存在较大难度,加之统计制度、统计范围、统计指标与统计方法的不完善和不规范,导致所统计的环保投资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直接影响了环境科学决策。比如,由于对环保投资、环保投入、环保支出等相关概念的界定不清晰、不严格,导致对绿色投资的核算和测度存在计量口径上的差异。唐国平等(2013)、胡珺等(2017)、王等人(Wang et al., 2018)、张琦等(2019)学者采用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书、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文件或者财务报表附注在建工程中披露的环保投资金额来衡量绿色投资。张济建等(2016)则采用内容分析法来衡量企业的绿色投资,在对企业绿色投资根据一定内容分类后,按照无投资、投资较少、投资中等和投资充分进行0—3分的赋值评分,来确定企业的绿色投资规模。虽然两种测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均能反映企业在绿色实践中所付出的努力程度,但由于绿色投资的内涵和结构在界定上的差异,其精确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上述分析可见,现有学者对绿色投资的概念界定具有交叉性、重叠性、针对性和差异性,这既体现了绿色投资本身的丰富内涵,也反映了对其进行精确定义存在较大的难度。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观点,参考马延柏(2021)的思路,本文将绿色投资定义为:绿色投资是指为了控制和应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因人类活动的负外部性所导致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相关投资主体(如政府、企业、社会机构)从所积累的资本或基金中所支付的用于减少各种污染废弃物排放和提升资源循环利用、降低能源消耗和开发替代能源、整治生态系统退化和全球气候异常等而发生的支出和费用,其本质是以维护生态环境平衡为核心、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投资活动。因此,绿色投资除了能够获得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也能实现相应的经济效益。这意味着,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并非对立的关系,经济增长不能仅以资源环境的巨大消耗为代价,而应反哺生态环境。为了实现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生产与消费要遵循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环保原则,在绿色投资的广泛主体中,企业应该成为众多主体中的核心主体。因此,本文的绿色投资主要强调基于微观企业这一研究对象^②。对于这类投资的确认,《企业会计准则》提出企业可将环保相关资本支出列入相关资产(如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或当期费用(如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的账务处理原则(吉利和苏滕,2016;崔也光等,2019)。

此外,对绿色投资的概念认识还要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联系。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

^① “其他”是指企业间接参与环境保护而发生的支出,比如,参与开发新能源、向环保基金会捐款、投资环境公司等。

^② 基于这一处理原则和上述学者对绿色投资的界定,企业发生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各项资本支出均属于本研究所界定的绿色投资范围,具体内容和构成包括:购买环保设备、与环保有关的技术改造与研发、工业三废等污染物治理、脱硫脱硝设备的购建与锅炉改造、废物循环利用、清洁可再生项目建设、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与绿化、环保罚款与捐款等支出和费用。

可持续发展理念，其含义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理念重点强调对人口、生态、社会、经济与资源利用之间关系的协调，从而实现社会、生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绿色增长、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概念，也是与这一理念相关的发展路径。而微观企业的绿色投资行为，既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响应与诠释，也是企业开展绿色投资的思想来源和行动指南。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系统性相比，绿色投资理论侧重于环境问题，但又兼顾资源和社会经济。与传统投资相比，绿色投资能够形成绿色生产力。在生产与消费上，绿色投资要求企业、消费者和其他社会成员秉持节能减排、循环再利用的原则，保证从投入到产出、从消费到再生产各个循环和流程的清洁环保。其本质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理念，通过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形成的绿色资本，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进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因此，绿色投资能够反映环境价值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作用，其重要性在于消除经济增长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把生产投资与防治环境污染统一起来。

三、绿色投资的影响因素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不同层级行为主体的绿色投资行为都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环境治理的最终执行和实施角度来看，企业是践行绿色投资的核心主体。这是因为，企业既是经济的主体，又是能源资源的主要消耗者和环境污染的主要生产者。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尤为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污染控制和环境治理的源头在于从企业自身寻求减少污染物排放和资源浪费等问题的解决途径，即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因此，本文对绿色投资影响因素的梳理主要关注对微观企业的行为选择。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既有涉及企业内部和自身条件的，也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从影响因素的意愿关系来讲，可以分为主动因素和被动因素；从影响因素的作用阶段来讲，可以分为驱动因素和影响因素。唐国平和赵佩琪（2021）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内外部因素，但研究视角聚焦于公司治理，对公司治理以外的因素未做讨论，也未区分影响因素的意愿关系和作用阶段。

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企业缺乏投资新技术以创造公共利益的动力，面对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环境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才能得到妥善解决（Popp et al., 2010）。无论在早期还是现在的环境治理中，环境规制始终是影响企业绿色行为的关键因素。制度压力会驱动和引导企业对可再生环保项目等进行投资（Saunila et al., 2018），提高环境监管力度，有利于政府引导企业投资环境技术（Leiter et al., 2011）。张济建等（2016）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具有积极作用，这一行为能够改善环境质量。马珩等（2016）则认为，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水平不能促进绿色投资规模的增加，二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他研究则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U型或倒U型关系（唐国平等，2013；李强和田双双，2016；Huang & Lei, 2021）。此外，环境规制在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如媒体监督、公众呼吁）促进绿色投资的路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王云等，2017；Liao & Shi, 2018）。

在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还有诸多因素在影响行为主体的绿色投资行为。王云等（2017）发现，媒体监

督对企业绿色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有效提升这一作用。廖和施（Liao & Shi, 2018）的研究显示，公众呼吁对增加绿色投资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公众呼吁促使地方政府实施更严格的环境监管，从而鼓励企业增加绿色投资。产业结构、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对绿色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开放性、能源结构、碳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对绿色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埃劳德等（Eyraud et al., 2013）从宏观视角评价了绿色投资的决定因素，发现经济增长、低利率的金融体系、高燃料价格是推动绿色投资的最主要因素。李四海等（2015）表示，市场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强，行业内的绿色规范会对落后者造成压力，促使个体履行社会责任，对绿色投资的执行效果趋好（李强和田双双, 2016）。此外，资金对企业绿色治理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购买环保设备、进行环境技术研发等活动都要求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支持，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特别是高能耗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因素。杨等人（Yang et al., 2019）认为，政府补贴是支持中小型可再生能源企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刘艳霞等（2020）发现，融资融券制度对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吕明晗等（2019）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提升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从企业内部而言，查里里等（Chariri et al., 2018）发现公司规模、外资、行业概况和审计委员会会议频率对绿色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王等人（Wang et al., 2018）发现，董事会主席的政治关联对绿色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冗余资源数量对政治关联与绿色投资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根据唐国平和赵佩琪（2021）的总结，股权结构、产权性质、高管特征、董事会特征与党组织参与等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上述文献的研究结论可以做出如下归纳：第一，影响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环境规制（如行政处罚、认证体系、排污费、环境税、环保补贴政策）、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制度（资本支持程度，特别是绿色金融发展程度）、市场竞争程度、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包括能源价格）、外资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外部监督机制（主要包括新闻媒体报道、公众关注和呼吁）、碳市场（绿色交易体系）等，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特征（如企业规模、所有权属性）、公司治理（如股权结构、高管特征、董事会特征、党组织参与、委员会设立情况）、内部控制、公司战略（如采取差异化战略还是成本领先战略）、盈利能力等。第二，从投资意愿划分，环境规制和外部监督机制是影响企业绿色投资的主要被动因素。绿色投资主要表现为一种被动行为，企业践行该类投资的目的主要是迎合政府环境监管的需要（唐国平等, 2013；张济建等, 2016；Liao & Shi, 2018）。如果企业仅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环境效益，其环境违规行为将导致企业面临行政处罚、形象声誉受损、市场份额缩减等多种风险，迎合利益相关者的监管十分必要。另一方面，绿色投资也表现为一种主动行为。彭海珍（2007）认为，企业参与环保实践的主要动机是获得竞争优势；麦克斯韦和戴克（Maxwell & Decker, 2006）表示，企业参与环保投资活动的动机包括节约生产成本、应对环境监管、建立企业形象。因此，积极主动地通过绿色行为提升竞争优势已成为现代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重要决策选择。而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基于被动还是主动，则要依据企业的战略选择和所处发展环境的变化进行具体判断和分析。第三，上述所有因素对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影响在最初决策与后期执行上是存在差异的。企业并不会主动参与绿色实践，是什么因素驱使它决定开展绿色投资活动，这是驱动因素的作用；当企业决定实施

绿色投资后，又会有哪些因素影响其后续投资的效果和再投资的意愿，这是影响因素的作用。马延柏（2021）认为，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是企业开展绿色投资的两个基本动因；李强和田双双（2016）认为，市场竞争与环境规制具有互补性，以上观点恰好反映了被动因素和主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原因在于，在环境治理的初期，企业绿色投资主要由政府环境监管驱使。随着环境治理形势日益严峻、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以及受监管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率先接受环境监管的企业往往因为绿色形象而成为市场领先者。绿色进入壁垒促使更多的企业开始由被动接受监管转向主动参与绿色治理，以提升市场竞争优势。而且，无论是内部因素（如公司战略选择、公司治理）还是外部因素（利用绿色形象获得税收减免和融资优惠、吸引消费者等）的作用、抑或是其共同影响，最终都表现为因绿色投资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并获得竞争优势。

四、讨论与结束语

在全球环境污染形势日益严峻与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既是党中央实现中国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现阶段，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已成为各部门、机构、企业和公众的一项重要任务，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将会促进更多低碳技术的实现，使得实现“双碳”目标的绿色投资成为当前讨论的一个热点。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较为系统地总结了绿色投资的概念范畴及其影响因素。绿色投资的界定反映了其概念的宽泛性和多维特征，应主要从定义、内容与构成、测算三个方面进行把握；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对绿色投资行为主体（如政府、企业、各种机构）的区分。对于影响因素的分析，应重点关注各因素对投资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在来源方面的差异，以及影响因素在不同划分视角下的关联性，要从因素来源、投资意愿、影响阶段三个角度分析影响绿色投资决策及其执行效果的因素。

虽然绿色投资对实现节能减排、改善环境质量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企业的绿色投资活动在企业内部受到资源基础约束（如融资约束、缺乏拥护环境战略的管理者、创新能力），在企业外部受到环境规制和舆论压力等多重因素困扰，致使企业存在绿色投资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缺乏资金支持、投资效果不理想等现象。因此，一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利用环保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增加绿色投资，同时采用多种环境规制工具以平衡绿色投资市场的竞争。环境政策要引导企业建立一个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竞争性市场秩序，激发清洁技术创新的产出效率，扩大清洁能源在市场的普及、应用和消费，使清洁技术和绿色能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二要激励企业优先加强重污染和高能耗领域的环保投资和技术研发，优化绿色投资结构和资金配置方向，避免片面追求绿色投资在总量和规模上的扩大，重点把握绿色投资的质量和效率、方向和应用场景等方面。要促进技术变革与实践应用相结合，防止技术创新与现实需求脱节。绿色技术创新要以市场为导向，为绿色技术的商业化提供应用场景，使高昂的研发运营成本和绿色技术创新转化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三要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直接融资，加强对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的资金支持，为绿色技术的研发创

新、成果转化和落地应用提供可持续的资金基础。四要发展环境共建共治体系,公众监督、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作用不容忽视,非制度因素对形成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极为关键。同时,企业要重视环境战略部署,协调总体战略目标与环境战略之间的关系,提升绿色投资决策对企业长期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性作用。例如,将高管对企业环保实践的重视与支持纳入高管的薪酬与绩效考核体系,以是否将环保投资决策和环境战略纳入企业整体战略规划、是否支持绿色供应链活动、是否实施全面环境质量管理等作为考核依据。

参考文献:

- [1] CHARIRI A, BUKIT G, EKLESIA O, et al. Does green investment increase financial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donesian companies [C]. E3S Web of Conferences, 2018, 31: 09001-09001.
- [2] EYRAUD L, CLEMENTS B, WANE, A. Green investment: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J]. Energy Policy, 2013, 60: 852-865.
- [3] HE L, ZHANG L, ZHONG Z, et al. Green credit,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and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50 listed companies of China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 208: 363-372.
- [4] HUANG L, LEI Z. Ho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 corporate gree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79.
- [5] LEITER A, PAROLINI A, WINNER 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European industry data [J]. Ecological Economic, 2010, 70(4): 759-770.
- [6] LIAO X, SHI X. Public appe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 Energy Policy, 2018, 119: 554-562.
- [7] MAXWELL J, DECKER C.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nd responsive regulation [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6, 33(4): 425-439.
- [8] POPP D, NEWELL R, JAFFE A. Energy, the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M] // HALL B, ROSENBERG N.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volume 2. Princeton: Elsevier, 2010, 873-937.
- [9] SAUNILA M, UKKO J, RANTALA T. Sustainability as a driver of green innovation investment and exploitation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179: 631-641.
- [10] SCHALTENBRAND B, FOERSTL K, KACH A, et al. Toward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anagerial green investment patterns — a USA-Germany comparis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015, 53(20): 6242-6262.
- [11] WANG K, ZHANG H, TSAI S, et al. Does a board chairman's political connection affect green investment? — From a sustainable perspective [J]. Sustainability, 2018, 10(3): 582-582.
- [12] YANG X, HE L, XIA Y, et al.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s: the threshold effect [J]. Energy Policy, 2019, 132: 156-166.
- [13] 崔也光, 周畅, 王肇. 地区污染治理投资与企业环境成本 [J]. 财政研究, 2019(3): 115-129.
- [14] 胡珺, 宋献中, 王红建. 非正式制度、家乡认同与企业环境治理 [J]. 管理世界, 2017(3): 76-94, 187-188.
- [15] 吉利, 苏滕. 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动因: 合规还是利益? ——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会计研究, 2016(11): 69-75.
- [16] 李四海, 李晓龙, 宋献中. 产权性质、市场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于政治寻租视角的分析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1): 162-169.
- [17] 李强, 田双双.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 ——兼论市场竞争的影响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 1-8.

- [18]刘艳霞,祁怀锦,刘斯琴.融资融券、管理者自信与企业环保投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5):102-112,159.
- [19]逮元堂,王金南,吴舜泽,等.中国环保投资统计指标与方法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S2):96-99.
- [20]吕明哈,徐光华,沈弋.货币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管理,2019(11):55-71.
- [21]马珩,张俊,叶紫怡.环境规制、产权性质与企业环保投资[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6(12):47-52.
- [22]马延柏.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研究[J].环境经济研究,2021(2):57-79.
- [23]孟耀.绿色投资问题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6.
- [24]彭海珍.影响企业绿色行为的因素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53-58.
- [25]唐国平,李龙会.企业环保投资结构及其分布特征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4):94-103.
- [26]唐国平,李龙会,吴德军.环境管制、行业属性与企业环保投资[J].会计研究,2013(6):83-89,96.
- [27]唐国平,赵佩琪.公司治理与企业环保投资:文献综述[J].会计之友,2021(13):77-83.
- [28]王云,李延喜,马壮,等.媒体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J].南开管理评论,2017(6):83-94.
- [29]张济建,于连超,毕茜,等.媒体监督、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5):91-103.
- [30]张琦,郑瑶,孔东民.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研究,2019(6):183-198.

Green Investment: Concept Defini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A Yanbai

Abstract: How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rough green invest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inly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concepts related to green investment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green investment behavior. First, the concepts related to green investment are sorted out and defined from three aspects: definition, content composition and measurement. Seco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green investment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are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rket competition, public supervis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ove factors is discussed and summa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actor source, investment intention and impact stage. The work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green investment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and optimizing green investment activities.

Keywords: green invest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defini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责任编辑:沈娟)